

先秦秦汉史史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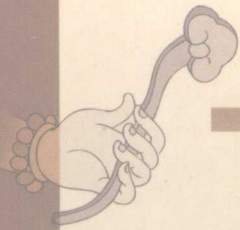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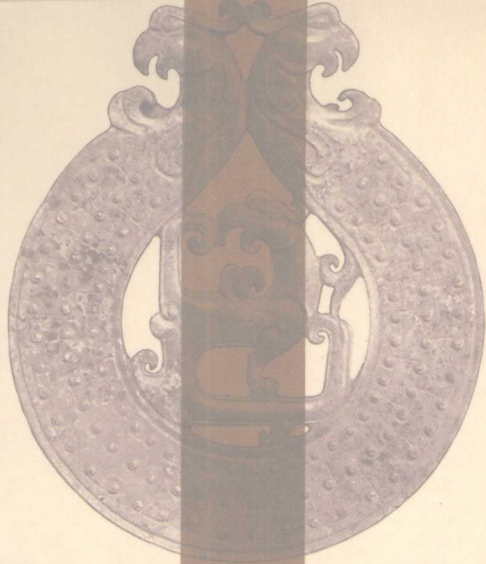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不仅介绍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情况，同时还介绍这些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年代或大致时代情况。本书重视并特别介绍了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诸子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资料。本书对古文字资料和古文文献资料并重。同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也作了一些介绍。本书十分注意利用战国秦汉出土文献资料来考证古书的年代问题，并注意利用出土古文字及其上古汉语语法及其特殊虚词来判断古书的年代问题。本书对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文化、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和教师是很实用的工具书。



王晖 贾俊侠 著





XIANQIN

QINHANSI

SHILIAOXUE

ISBN 978-7-5004-6760-1



9 787500 467601 >

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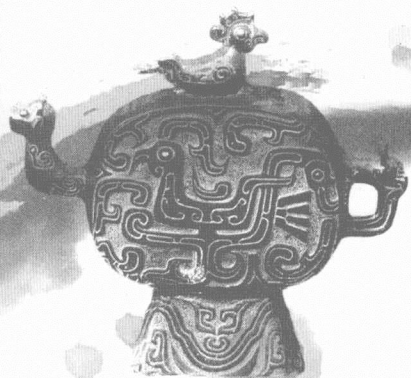
先秦秦汉史史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不仅介绍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情况，同时还介绍这些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年代或大致时代情况。本书重视并特别介绍了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诸子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资料。本书对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资料并重，同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也作了一些介绍。本书十分注意利用战国秦汉出土文献资料来考证古书的年代问题，并注重利用出土古文字及其上古汉语语法及其特殊虚词来判断古书的年代问题。本书对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文化、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师是很实用的工具书。



王晖 贾俊侠◎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秦汉史史料学/王晖, 贾俊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04 - 6760 - 1

I. 先… II. ①王…②贾… III. ①古文献学 - 史料 - 中国 - 先秦时代
②古文献学 - 史料 - 中国 - 秦汉时代③古文字学 - 史料 - 中国 - 先秦时代
④古文字学 - 史料 - 中国 - 秦汉时代 IV. G256.1 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21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臻 树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典雅设计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这一部《先秦秦汉史史料学》最初是我在为中国古代文献学、先秦史等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先秦史料学”课程所编的讲义。从2000年上半年开始，我为当时中国古代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先秦史料学”，但是我发现当时根本没有这类现成的研究生教材。“历史文献学”或“中国史料学”的教材倒是有几部，然而涉及先秦部分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在我看来，也基本未能体现先秦史料学的特点。因为我觉得先秦史料学的特点与秦汉之后的时代大有区别，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应该是古代文献、古文字资料和一些重要的考古资料一起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就自己动手编写讲义。从2000年开始至今已经在六届研究生中试用，并且是不断进行修改，反映不错。后来大约是2001年，在贾二强教授的积极引介和鼓励下，申报了全国古籍整理委员会的所级古籍整理项目“先秦秦汉史史料学”，并获得立项。但是，由于我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任务，“汉代史料学”部分便请我的研究生贾俊侠教授来承担，我则集中修改完善“先秦秦代史料学”部分，终于在今年暑假期间完成了这项工作，并提交出版社出版以飨青年学子，同时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书后面还附有三个附录：附录一和附录二是我过去写的《古文字中记数使用“又”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是根据甲骨金文及战国文字的记数中使用“又”的变化规律情况，去判断一些年代模糊、说法纷纭的古书成文年代问题，附录三是贾俊侠教授作的《二十世纪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部分重要论著要目》，一并请读者参阅。

下面我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编撰体例、方法及其特点。

其一，本书介绍的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介绍先秦秦汉时期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性质及主要内容情况；二是介绍这些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成文年代或大致的成文年代情况。

其二，本书特别介绍了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诸子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资

料。因为传说时代的专门性的文献资料十分少，只有《尚书·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史记·五帝本纪》、《世本》、《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等书篇。但是其他这种传说时代的资料往往散见于战国秦汉的文献之中，例如《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礼记·礼运》、《易·系辞》（上、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篇之中。本书很重视这些战国秦汉时代古文献资料中所记的传说时代的资料，并选择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作了介绍。

其三，因为先秦古文献资料有限，所以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资料并重，同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也作了一些介绍。特别是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商代和西周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本书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对它们作了介绍。

其四，利用战国秦汉出土的古文献原貌来考证先秦古书的真伪问题。例如，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又出土了《孙臆兵法》十六篇的残简，可证《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都是存在的，传世的《孙子兵法》不伪。在银雀山西汉墓葬中还出土了《晏子》、《太公》及《尉缭子》等竹书的残简，可证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不伪。

其五，利用出土古文字及其上古汉语语法及其特殊虚词来判断古书的年代问题。这是本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也是本书的一个创新点。例如，商代直接把主谓词组放在一个中心词前作修饰语，不用任何虚词来表示这种特殊的语法关系；西周时开始用“攸”及“迨”表示所字词组；战国早期才出现用“所”字来表示的所字词组。这种所字词组用词用法的历史演变可以判断一些时代不明的古文献的成书年代，还可以判断一些先秦古书中哪些是后人增添的句子。又如，从西周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可知，“之”字放在主谓之间取消独立性的用法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一种句法现象，利用这种特点可以断定《尚书》中的《商书》诸篇最后的写成年代应是春秋时期，时代不可能太早。再如，先秦时期记数的整数与零数之间用不用连词“又”或“有”有比较明确的时代区别，尽管古文献中用不用连词“又”或“有”的时代界限不大明确，但是古文字资料中使用“又”的演变兴衰时代情况是十分清楚的，它的兴衰变化可以作为判定古书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尺。

目 录

第一章 概 论	(1)
一 史料学的研究目的与内容	(1)
二 先秦秦汉时期史料学的特点	(1)
三 古书年代与辨伪问题	(4)
四 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相互关系	(11)
五 关于处理先秦文献的一些方法	(12)
第二章 古史传说时期	(16)
一 从古文字材料看战国秦汉时古文献中 所见传说资料的史料价值	(16)
二 传说时代的史料	(18)
三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以及反映传说 时代的古文字资料	(24)
四 夏代史料与考古资料	(29)
第三章 殷商时代	(33)
一 商代的文献资料	(33)
二 商代的考古资料	(41)
三 商代甲骨文资料	(46)
第四章 西周春秋时代	(67)
一 西周春秋古文献书籍	(67)
二 西周春秋时期金文及其他考古资料	(107)
第五章 战国秦朝时期	(123)
一 战国时期的古代史著和现代史著	(123)
二 战国秦朝时期的古文献资料	(129)
三 从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看战国文献的年代问题	(139)
四 战国秦朝时期的出土文字资料	(143)
五 有关先秦史料的汉代简帛资料	(151)
第六章 两汉时代	(155)
一 两汉史料概述	(155)

2 先秦秦汉史史料学

二 两汉文献资料	(157)
三 两汉考古资料	(239)
附录一 古文字中记数使用“又(有)”字的演变及其 断代作用考	(291)
附录二 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	(306)
附录三 20世纪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部分论著要目	(315)
附录四 古文字著录书目简称与全称对照	(332)

第一章 概 论

一 史科学的研究目的与内容

史科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其任务与目的是从事史料的搜集、核勘、考证及其编纂，而主要工作是史料的整理与鉴别，把价值不同的史料区别开来，把内容不同（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思想、文化，抑或是宗教、民族等等）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与错误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时代不同却为同一事件的史料区别开来，并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学习和研究史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把握和分析同一事件各种不同史料的不同价值情况，使我们的古史研究的论证更充分有力。

史科学是有关历史资料研究的学问，依其史料内容大致可分四个方面：（1）古文献史料。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与历史有关的文字资料。如十三经、二十五史、历史档案、地方史资料等。（2）出土的文字资料。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敦煌遗书等。（3）考古文物等实物史料。如古器物、古建筑、古迹遗址等。（4）口碑史料。口碑史料又称口传史料，是指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史诗等。口碑史料也指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以及人们早期社会的历史，是靠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而保存下来的。战国秦汉时期有关夏商周以及黄帝尧舜的传说资料十分多，这些实际上也是一种口碑史料，是有很高价值的史料，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史料是需要认真鉴别的。

二 先秦秦汉时期史科学的特点

1. 先秦秦汉时期史料来源的多样性

如果说秦汉之后的祖先留下来的是以古文献资料为主，那么先秦时期就完全需要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一齐上——需要说明的是古文字本属考古资

料，虽然这些古文字材料现在已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但从学科划分上它又属于考古学。因此，我们在先秦秦汉史的史料学介绍中，不仅要介绍古文献资料、古文字史料，还要介绍一些考古遗址和有关的资料。

先秦秦汉时期史料学有一个演变趋势：（1）商代以前（包括商代）是以考古资料（包括古文字资料）为主，古文献资料为辅。因为这时考古资料不仅多，而且是当时人留下来的实物，是第一手的可贵资料。而古文献资料则是后代人根据传说记录下来的。虽然我们不能对这些资料像疑古学者那样轻易地加以否定，但这些传说在长期流传并形成文献的过程中又经过屡次传抄，肯定不是原汁原味。只是有的掺水多，有的掺水少罢了。（2）西周春秋时期是以古文字资料（金文）为主的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平分秋色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古文字资料从考古资料中独立出来，那么，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古文献资料就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所以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的拉锯战时期，是有道理的，这两个方面均应受到重视。（3）战国秦汉以来，是以古文献资料为主，考古出土的文物文字资料为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当然今天的史料又有了新的领域：音像资料、胶片、磁带光盘等新型的知识载体，也都是将来的宝贵史料。

2. 二重证据法与多重证据法

（1）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提出来的。其历史背景之一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当然，疑古学派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其起源于宋代，到清代古书辨伪风气逐渐兴盛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达到高潮。这时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继承了清儒辨伪的学风，进一步怀疑古史传说时代，甚至提出“东周以上无史学”的观点。这是由于清代末年随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现代学术转变。这种转变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使人们从完全相信“三皇五帝”的盲目信古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去考察历史的真实面目。但是疑古活动显然过分了，不仅黄帝、颛顼等五帝被怀疑，尧、舜、禹被怀疑，甚至春秋孙武也被怀疑是战国时的孙臆，庄周被说成扬朱……王国维是对这些现象不满意才提出“二重证据法”的。

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历史背景之二是清末大量新史料的发现。（1）由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而建立了甲骨学。（2）敦煌遗书的发现而建立了敦煌学。（3）汉晋简牍的发现。（4）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王国维因此而称清末是学术发现的年代，并对这些发现的意义作了肯定：孔子曾感叹“殷礼不足征”，现在可以考证了；宋儒以来看不到的魏晋隋唐时的古书抄本，现在可以看到了。王氏追溯历史，指出由新发现将兴起一代新学问。他

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所发现之学问》中说：“古来所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按：即古文经学家学派）；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①也正是由于这些新材料的出现，王国维对疑古思潮进行了批评。王氏批评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②可见，王氏对疑古有肯定有批评：肯定怀疑的态度与批评的精神是可取的；而批评的方面是疑古过分了。不仅疑古书，而且也怀疑古史人物的存在，如对尧、舜、禹这些传说时代的古帝王也一概怀疑。王氏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古史材料未做充分处理。但如何充分处理呢？他认为，古书未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已得证明的，必须加以肯定。^③

如何肯定已得证明的古籍文献呢？这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氏在《古史新证》中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④

先秦文献中可证全为实录者不太多（当然也不是全无，如《逸周书·世俘》篇即是），然更多的是百家不雅驯之言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如“王亥”事迹，见于甲骨文，而《山海经》、《世本》、《天问》等书篇中也有。《山海经》向来被视为神话，以此来看，《山海经》的确保留了远古的不少历史传说，只可惜无年代序列。王氏之说影响甚大，由此形成中国20世纪学术转变期的史学乃至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2）多重证据法

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陈寅恪在阐述王氏之学特点时提出了“三重证据法”。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总结王氏之学的特点说：“一曰取地

① 《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③ 同上书，第2—3页。

④ 同上。

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且认为：“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陈氏对王国维学术的总结实际上已超出王氏“二重证据法”的范畴。可惜的是，人们只重视王氏“二重”说，而对陈氏之说未深加探讨。我以为依陈氏之说，可将国学研究法概括为“一论三史料”。“一论”是指某一学科中理论方面的各种学说。三种材料：一是地下出土文物文字，二是古文献资料，三是外国异族的材料（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对史学研究而言，应是一种理论，即史学理论与方法；三种史料，一是地下出土文物文字及考古资料，二是古文献史料，三是外文中的有关史料（尤其是唐宋以来）。对先秦史而言，应是一论，即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三种史料：一是古文献史料，二是地下出土的文物考古及古文字资料，三是中外民族学资料。我们强调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作为理论或方法，是因为人类各个民族虽有各种差异。但各种文化又都有一些具规律性或普遍性的演化阶段。因而就先秦史而言，我们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不仅可获得可供借鉴比较的史料，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而且可以提供视野更为宽阔的理论模式和参照系统，使我们对某些历史现象作出更合理的解释或推论。

三 古书年代与辨伪问题

先秦文献资料本来就极为有限，但这有限的文献也多数是时代不清、作者不明。因为许多先秦古籍年代不清，作者不详，所以考证作者、判断年代便成了史料学中十分重要的工作。过去学者在古书辨伪中总结伪书有二种，一是自觉地作伪，如古文《尚书》中的许多篇章，汉成帝时张霸伪造百两篇《尚书》就是这种自觉作伪的典型；二是不自觉地作伪，先秦诸子中许多书籍，如《管子》、《黄帝书》、《周礼》等等，其书明显不是其人所处的时代写成，但名称却冠以某人，故称不自觉地作伪。我们认为，前者可称伪书，后者不可称伪书。书名上的某人只表示其书内容是属于书名人物的这一学派，是作者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作成的。或是某人在世时还没有形成学派，在战国时才有某一学派却命以某人，仅表示战国时的这一学派。如《黄帝书》、《管子》、《神农》等。

两千多年来，由于政治的需要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学风，于是经学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热点。但由于先秦古文献资料有限，学术问题便众说纷纭。虽然众说纷纭，但由于政治的力量和独尊儒术的学风，问题便也不难解决。司马

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又在《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布衣身份为“学者宗之”，而且“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就是说，自西汉以来尽管文献载籍极其繁多，但对于学术问题的裁决判断，是以儒家的“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鉴别是否真实可据的标尺。但对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的裁决判断，则是以孔子言论思想作为评价的标准。如依孔子思想言论作评价的标准，那么殷末周初的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是不会有不仁之举的。所以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可见孟子就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如周武王是“仁人”中的“至仁”，怎么会“血之流杵”呢？所以就断言描写这些事实的《武成》肯定是不可信的了。

唐宋怀疑古书就更进一步了。子书辨伪，唐代有柳宗元，宋代辨伪有两位最主要的学者就是朱熹与叶适。柳宗元断定《鹖冠子》、《鬼谷子》、《亢仓子》、《文子》等是伪书，今天以出土简帛资料看来，疑伪就过头了。这一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论述。

清代以来的学者，古书疑伪之风越来越强烈，成就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其突出成就是阎若璩、万斯同等学者在经学特别是《尚书》辨伪方面的成就，为学术界众望所归，其成绩今天应充分肯定。但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对古书的辨伪就大胆地超越古人，许多问题今天看来也是过分了。到近代梁启超的古书疑伪就显得更为大胆，由于他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突出了古书考证辨伪的理论与方法，其影响则更大。本来清乾隆中叶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已经明确用“全伪”或疑撰者或疑时代来怀疑古书了，但梁启超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说“《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免敷衍门面”，认为“总之《提要》所认为真的未必真，所指为伪的一定为伪，我敢断言”。^①梁氏的这一思想是那个古书疑伪时代的代表。

其实，古书在形成过程中是十分复杂的。余嘉锡曾在《古书通例》中论及古书命名的一些原因：“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又具体地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最典型的就是《司马法》。《史记·司马穰苴传》载：“齐威王使

^①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1—93页。

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非一代更非一人），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即《司马法》。这可说明《司马法》成于战国中期齐威王时。而司马穰苴则与齐景公、晏婴同时，时在春秋晚期。《司马法》并非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非他一人兵法，是包括了许多时代的观点和兵法，当然有比司马穰苴早的，也有比他晚的。

先秦时期古书的成书年代，均可作如是观。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也说：“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书中记及其人之后事，及其文词之古近错出，固不足怪。至于诸子书所记事实，多有讹误，此似诚有可疑。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①所以对大部分古书，我们要探讨其来源，不可简单地以“伪”字来加以判断。春秋之前文献史料甚少，而战国秦汉时诸子百家中追忆春秋之前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资料甚多，这些史料需要好好地整理方可加以利用。从我国史学研究经过“信古—疑古—释古”的历史看，完全信古是不对的，但过分地疑古同样也是不对的。

从战国时代到清末，文人学士皆相信所谓的“三皇五帝”，均有详尽的年数，并且有详细的年代图表，这当然令人难以相信。

为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会出现这一疑古学派？其因有二：一是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入，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怀疑的精神，封建时代的信古派则没有怀疑的精神；二是清代古书辨伪派的直接经验及其成果，如崔述等。其学说主要体现在顾颉刚所谓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否定了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这是对的。中国古史“层累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就以偏赅全了。

疑古派学说在当时对于转变传统史学观念、认真审查史料、建立现代史学观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有负面影响，疑古过度了。胡适为近代疑古学派之先导，20世纪20年代就将疑古精神概括为：“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顾颉刚也说，“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0页。

晶”等。^①这就不是客观的史料审查工作。对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如对老子的怀疑——认为老子与孔子的关系是后人伪造的；还有对孙子（武）的怀疑等，显然这些怀疑都过分了。

近现代疑古派学者的问题还出现在对于传说材料的认识上。顾颉刚先生就认为古史传说“大半由于时代的发展，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诸子虽有利用上古传说宣传自己主张的倾向，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无编造历史的功利性目的。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一章中认为，在古史中，传说与历史史实混而不分。历史事实被修饰扩大，就与传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者。”对顾氏之说，王国维以金文的材料加以批评，引用春秋时秦公敦（簋）说“冢宅禹责（迹）”，齐侯罇铭文“宗宗成唐……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认为这些金文材料与诗《大雅》、《商颂》、《鲁颂·閟宫》、《尧典》、《皋陶谟》、《禹贡》中的记禹之事迹互相呼应。并且说：“然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②王氏这里用的正是二重证据法来证明禹应是历史人物，而不是神话人物。如果说王国维是从史学实践上批评疑古派，而冯友兰、傅斯年及钱穆等学者则是从理论上批评疑古学说，并进一步提出释古之说。信古、疑古、释古是近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1935年提出来的。^③他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欢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④

傅斯年认为应把古史传说材料当作“间接材料”，把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等当作直接材料。间接材料当然不如直接材料，为什么呢？“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正确的做法是用直接材料去更正间接材料：“一旦得到

①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1册，第63页。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5—6页。

③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书之看法》，见《三松堂全集》第11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④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359页。

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① 但如果没有直接材料，就不能否定间接材料。这一点，钱穆说得十分清楚。他在1939年写成的《中国古史大纲》中，批评顾氏古史观为“极端之怀疑论”。他认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之伪造。”“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为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两立，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我认为钱穆之说是比较合理的。传说资料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完全否定。“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这应是我们对待古籍中传说资料的正确态度。

张荫麟曾经指出疑古派的方法是“默证”。他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这种“默证”的疑古之法，与实证的史料审查不是一回事，其经不起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资料越来越多的检验，是必然的。近年来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获得学术界多数学者的肯定和响应，其原因也是在这里。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先秦秦汉简帛的不断出土，古书疑伪者论定的伪书不少已被证明是错的。过去认定《老子》晚出，且是众口一词，几乎可以盖棺论定，而20世纪70年代就有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帛书出土，90年代又有战国中期偏晚的《郭店楚墓竹简》的简本《老子》与世人见面。今传世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等书，曾被梁启超认为属“全部伪绝对决定者”之列，认为《晏子春秋》大约是西汉人伪撰，并说“此书依我看纯属伪书，没有费力校释的价值”，认为《六韬》是汉代以后人伪作，《尉缭子》是晋至唐人陆续依托。^② 然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

①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第69—93页。

汉前期墓葬中出土了《晏子》、《太公》及《尉缭子》等竹书的残简，内容与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基本相同。可见梁启超对这几本书的怀疑都是不对的。我国古代书籍从开始成书到普遍流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可证这几种书的著作年代应该不会晚于战国。过去因为《左传》、《国语》中不见孙武其人，《史记》中记载了孙武并言孙武及其后人孙臆皆有“兵法”之书，但现存只有《孙子兵法》，却不见《孙臆兵法》，于是《孙子兵法》被认为就是《孙臆兵法》，甚至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而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既出土了《孙子兵法》13篇及其佚文五篇的残简，又出土了《孙臆兵法》16篇的残简，可证《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均是存在的，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都是不容怀疑的。《文子》也曾被怀疑是伪造的古书，梁启超认为是晋至唐人陆续依托，也有学者认为是根据《淮南子》编成的，然1973年在河北定县西汉后期的中山王墓中发现了《文子》的竹书残简，证明《文子》也并非伪书。20世纪上半期还有人否认屈原的存在，并认为过去旧说宋玉的许多辞赋都非其所作，而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就出土了《离骚》和《涉江》残简；有的学者通过对银雀山汉简《唐勒赋》的研究，证明了宋玉大部分赋作的可靠性不容置疑。马王堆汉初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也证明过去所说刘歆伪造《左传》的说法是错误的。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15号墓出土竹简有“易占”内容，经研究是过去所说的“三易”之一的《归藏》佚文。这证明了传世本《归藏》也不是伪书。但过去由于它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唐宋以来学者多以为是伪书，近代学者甚至认为《归藏》本来就是伪书，传世本《归藏》更是伪中之伪。^①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中有两个卦名与《归藏》卦名有关，于豪亮先生便推定《归藏》成书一定不会晚于战国，不是汉代以后人所伪造的。^②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一问题。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疑古确实走过头了，是值得反省的。其实，古书辨伪一般都是依照宋代以来古书流传的情况来判别的，但在宋代印刷术出现之前与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裘锡圭先生曾经分析这种现象说：

通过对西汉墓葬出土的大量竹书、帛书的全面观察，我们对当时的书籍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为前人已经提出来的早期古书没有专

① 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容肇祖：《占卜的源流》，见《古史辨》第3册。

② 于豪亮：《帛书〈周易〉》，载《文物》1984年第3期。